

臺灣學界對郭嵩燾研究之重要成果簡述

車行健*

一、前 言

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晚年更號玉池老人，嘗築室曰養知書屋，學者又稱養知先生。湖南湘陰人，生於清仁宗嘉慶二十三年(1818)，卒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七十四^①。

郭氏是個多面向的人物，生當清室由盛轉衰，動亂頻仍，風雨飄搖之際。對內，他經歷太平天國之亂；對外，他目睹西洋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他循著當時一般士大夫的足跡，透過科舉進入仕途，並進而見證且參與了這場中國三千年來未嘗有的大變局。他雖然出身湖湘，且與大多數重要的湘軍將領關係密切（如曾國藩[1811-1872]、曾國荃[1824-1890] 昆仲、左宗棠[1812-1885]等），但他並沒有在軍功中取得重要的建樹。不過由於他對洋務的注意與涉略，使得他在當時便以知曉洋務而受到曾國藩、李鴻章(1823-1901)的器重及中樞重臣恭親王奕訢(1833-1898)與文祥(1818-1876)的賞識與重用，晚年更膺任清廷首任駐英（兼駐法）公使，在洋務及外交領域中開創了一片天地。儘管郭氏在世的時候，他便因為洋務的意見受到國內許多守舊保守的官僚及士人的攻訐，甚至在他去世後，朝廷亦不准為他立傳賜諡，連其出洋所著書籍（《使西紀程》）亦因「頗滋物議」而「不准行」^②。但時移世轉，隨著中國近一步的走入現代世界，與國際接軌，歷史最終還是證明郭嵩燾是有相當遠見的，他的洋務經歷與識見受到後人高度的重視與

* 車行健，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① 以上皆見尹仲容創稿、郭廷以編定、陸寶千補輯：《郭嵩燾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上册，頁1、5；下册，頁1001-1004。

^② 見《郭嵩燾先生年譜》，下册，頁1009。

評價，遠勝過當時自強運動的健將如李鴻章、沈葆楨(1820-1879)、丁日昌(1823-1882)等人^③。

郭嵩燾之主要成就及受人重視之處既在洋務及對外交涉方面，因此學界長久以來對他的研究也是集中在這方面，臺灣的學界自不例外。這方面的研究，照現代學術的分類和分工的標準來看，主要是屬於歷史學門中的近代史或晚清史的研究領域，所以對郭氏研究的大部分重要成果也都是由治近代史及晚清史的學者所貢獻的，即使是涉及到他的學術思想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由於研究成果數量並不多，以下就大體依照研究成果的性質依次加以評述。

二、重要研究成果評介

(一) 尹仲容創稿、郭廷以編定、陸寶千補輯：《郭嵩燾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

這是臺灣學界對郭嵩燾研究的最重要的專著之一，該書雖題尹仲容創稿，但據郭廷以爲該書所寫的〈序〉可知：郭氏認爲尹氏的遺稿仍有須待補正斟酌之處，因此又「重行改寫」。所以這本年譜的實際撰作者仍是郭廷以。楊聯陞(1914-1990)曾對該書之體例及價值有如下的評介，其云：

《年譜》前數頁，有提要，綱領如下……綱領之下，又有簡目。這幾頁提要綱目，再加《譜》中用大、小、中三種字體分別綱目與註解，又在書眉有小字提要，書末有索引，對讀者都有很大的幫助。

除了這個體例上的長處之外，這部《年譜》的長處是資料豐富，文筆精簡（用簡潔的文言），又有許多附註，多數是解釋本文所說的事情的背景，非常方便。又有許多按語（大抵是郭廷以先生所加），據理就事原情立論，不偏不倚。對譜主的弱點（例如他對如夫人的特別看重，頗受譏議），並不隱諱。創稿的尹仲容先生、補輯的陸寶千先生、編定的郭廷以先生，都應該得到讀者的讚揚。^④

^③ 參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頁408-411。

^④ 見楊聯陞：〈郭廷以編定尹仲容創稿陸寶千補輯郭嵩燾先生年譜書評〉，《清華學報》10卷1期（1973年6月），頁115-116。

這部記錄郭嵩燾一生事蹟的年譜，除了忠實客觀地呈現譜主的生平經歷及學術思想之發展歷程之外，郭廷以還在譜前的〈自序〉中，概括了他對郭嵩燾一生的事業及其核心思想，他認為郭嵩燾的一生言行大都與「平亂」（太平天國之亂）與「禦侮」（以英國居首的外患）兩事相關。在平亂方面，郭氏倡議捐輸，進而抽收釐金，遂成為湘軍的主要財源。又首請製備戰船，於是曾國藩有練治水師之舉，為往後戰場的肅清攻克發揮巨大功效。此外，郭氏又曾週旋於湘軍將領之間，為之規劃獻替，如懇勸曾國藩出山、盛薦及保全左宗棠等事，皆對湘軍之壯大發展關係重大。在禦侮方面，郭廷以發現他受鄉先賢王夫之（1619-1692）「勢」、「理」之說的啓發，認為論勢，中國對外不可言戰，當循理而行。循理之外，應再濟之以禮與信。這些信念都貫穿了他的洋務具體作為。

郭廷以也對郭嵩燾的性格做了客觀的評判，認為他的性情褻急、自視太高、自信過強、孤持己志、動輒與人為忤等，而這些性格上的特點也導致了他在官場上的挫折與不如意，這也正是他不能施展懷抱的重大原因^⑤。

總的來說，郭廷以編定的《郭嵩燾先生年譜》雖已出版三十餘年，其價值卻依然極高，是研究郭嵩燾生平事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惟一比較遺憾的是此書未及採用《郭嵩燾日記》這一珍貴的第一手史料，使此年譜在資料完整性方面打了若干折扣，但這是當時在撰修《郭嵩燾先生年譜》時便已存在的資料限制缺憾，並無損於該年譜的學術嚴謹性。或許將來可以有人再利用包括《郭嵩燾日記》在內的更多新出現或新刊行的資料，將這部年譜編修得更為完善。

（二）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

汪榮祖教授此書在性質上來說是關於郭嵩燾的綜合性傳記，亦可說是臺灣學術出版界繼郭廷以的《郭嵩燾先生年譜》之後，有關郭嵩燾研究最具規模的專著。

在此書的〈弁言〉中，汪氏一開頭就開宗明義地宣示讀者，「這本書寫一個人，以及這個人生長的時代」^⑥。可見汪氏並不是孤立地看待郭嵩燾，而是將他還

^⑤ 以上俱參《郭嵩燾先生年譜》，上册，頁2-8。

^⑥ 見汪榮祖：〈弁言〉，《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頁1。

原到他所生存的時代環境中。而這個橫跨道光、咸豐、同治及光緒四朝，包含了十九世紀大部分的時代背景，又不僅只是局限在天朝的世界中，也涵蓋了以歐西文明為主的近代文明世界。當天朝固有的世界不得不去面對近代文明世界的時候，古老的中華帝國勢必遭遇到空前未有的挑戰與衝擊。一方面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挑戰，船堅炮利的衝擊；另一方面則又是近代文明向傳統社會的挑戰與衝擊。世界既走向中國，中國亦勢必要走向世界，汪氏此書有意藉著郭嵩燾的經歷，來將中國走向世界所遭遇的崎嶇與艱難的歷程展示出來，觀其書名「走向世界的挫折」可知作者的用心。然而既題名曰「挫折」，則可知郭嵩燾個人的經驗畢竟是不成功的，甚至可說是極為失敗的，不但郭氏所參與的走向世界的規畫與理想均未能實現，而且郭氏生前還橫遭謗議，不見容於當時的主流意見，「最後只好投閒置散，壯志不酬，含恨死於長沙」^⑦。

汪氏此書處理的另一個重點是特別對郭嵩燾的「感情世界」多所著墨。在汪氏看來，郭嵩燾不凡的思想雖早已見諸其奏稿與文集，但他認為這些文字祇能透露郭氏「理智世界」的大概，而其已刊詩集固亦有助於探討他的「感情世界」，但這些材料猶如浮光掠影，渺難捕捉，更何況詩集諸篇多無日期，也無以追蹤其感情的定點。至於他生活面的空白，更似鴻飛冥冥，不留痕跡。這些研究上的缺憾都在《郭嵩燾日記》的發現與出版之後，基本上獲得了解決。汪氏認為二百餘萬字的《郭嵩燾日記》既充實了郭之「感情世界」，亦能填補其生活面的空白。汪氏正因此契機而動念撰寫此書，其自承：

希望能充分利用此一難得的史料追蹤其足跡，重建郭氏的一生。嘗試將其生活（起居、旅行、應酬）、思想（對時務與洋務的認識）、與感情（在朝在野的喜怒哀樂）的「三度空間」，建築於道、咸、同、光的時代與環境之中。^⑧

汪氏確實是對此一難得的史料做了大量精細的利用，透過郭氏在日記中所記載的點點滴滴，不但將他外在的行蹤做了重建，而且也儘可能地還原其內心的心理感情世界。例如同治十三年（1874）朝廷因海疆多事而召見甫交卸廣東巡撫一職且獲准開缺的郭嵩燾入京，希冀能再啓用郭氏來處理洋務。然而此時的郭嵩燾正陷於一種救

^⑦ 同前註，頁2。

^⑧ 同前註，頁3。

時的無力感與懷才不遇的感慨之中。汪氏研究郭氏的心境，發現他在日記中曾記載二度夢見康熙。一次是同治七年四月三十日，康熙南巡，他扈從召對，為聖主明君辦事。第二次則是在同治十一年的二月初四夜裏，他在夢中聽說康熙已經復位，驚問相距百餘年，聖祖藏身何地而於今日突然復位？康熙答稱因見時局艱難，必須出來料理。他既喜又怕，怕的是將受重寄，恐有負平生之志而驚醒。汪氏以此推測，郭嵩燾至少在潛意識裏仍然是「不忘用世」的。郭氏在徬徨數月，莫知為計的情況下，最後還是在朋友們的慫恿下，決定北上應召，重返仕途^⑨。

整體來看，汪氏此書不失為極其成功的郭嵩燾傳記，不過或許是側重在郭氏的生平經驗以及處理中國與近代世界的關係，汪氏對郭嵩燾的洋務經歷及洋務思想敘的較詳細，相對來說，對郭嵩燾在傳統學術思想方面的表現及成就雖亦有敘及，但既不深入，也不夠全面，這是其明顯不足之處。

（三）陸寶千：〈郭嵩燾〉，收入王壽南總編：《中國歷代思想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44冊，頁1-27。〈郭嵩燾〉，《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年，頁372-418。〈郭嵩燾養知易傳輯〉，《漢學研究》11卷2期，1993年12月，頁361-382。

與汪榮祖教授偏重於郭嵩燾生平傳記及其面對現代文明世界的經歷之取徑不同，曾長期服務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陸寶千教授（已退休）則是對郭嵩燾的學術思想著力甚深。除協助郭廷以教授補輯《郭嵩燾先生年譜》之外，他尚有三篇專門研究郭嵩燾的著作。其中發表在《漢學研究》上的〈郭嵩燾養知易傳輯〉是陸氏讀《郭嵩燾日記》，取其中論《易》之語，依〈序卦傳〉而次第之，發現亦可成一家之言，故遂以「易傳」名之。由此可知，所謂「《養知易傳》」並非郭嵩燾生前有意為之的著作。不過陸氏也注意到郭嵩燾曾有《周易釋例》一書，他認為大約是郭嵩燾集《易經》中詞語之用法而求見其例者。陸氏自承未見此書，然又發現《郭嵩燾日記》中說《易》處皆就卦象以論人事，故將這些資料輯取排比，而以「《養知易傳》」名之^⑩。

^⑨ 同前註，頁198-199。

^⑩ 參陸寶千：〈郭嵩燾養知易傳輯〉，《漢學研究》11卷2期（1993年12月），頁361-362。

除此之外，收入王壽南總編輯的《中國歷代思想家》第四十四冊中的〈郭嵩燾〉一文，以及在《清代思想史》第八章中的〈郭嵩燾——理學家之洋務思想〉小節中，陸氏則比較全面且系統的闡述了郭嵩燾的學術思想。在〈郭嵩燾〉文中，陸氏分別概述了郭嵩燾的理學、禮學、史學及洋務思想。關於郭嵩燾的理學，陸氏認為郭嵩燾對理學的重視應是早年受到劉蓉(1816-1873)和曾國藩的影響，早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時，他已從事理學的工夫，而直至老年，還仍舊在實踐理學。郭氏之於理學，不但躬親實踐，而且還著有《性理精義劄記》及《大學》和《中庸》的章句質疑等著作。在後二書中，他既反對朱子的《大學章句》中綱領條目分疏之說，也反對朱子的〈致知補傳〉。此外，他還十分重視「勇」德，並且認為中庸之德須以禮為表達的形式，經由禮，一個人可以「復其性之善而歸於中」，所以君子有崇禮之功^①。

至於郭嵩燾的禮學，陸氏則以為郭氏既以為「君子有崇禮之功」，所以郭嵩燾便有《禮記質疑》之作。陸氏認為此書中有很多新的見解，其中包括：制度是範圍人心的、禮須適應時代、法制須適於人情、國家之間應當互相通曉彼此的制度等^②。

郭嵩燾在史學方面的研究，陸氏則是認為於道光二十三年，郭嵩燾在湖南辰州與張景垣論禁煙始末始知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於措理失宜，此後便開始「讀書觀史」。後來又曾與史地學家何秋濤(1824-1862)討論洋務，驚嘆何氏「經史傳記，先儒百家之言，昭著燦列，用不著直接參與洋務纔能知道」的言論，此後便從事於歷史的研究。郭嵩燾曾取秦、漢以來中國和外夷交涉的史實，「辯證其得失，發明其經世致遠之略」，寫成一部《綏邊徵實》，惜書雖成稿但並未出版。今日所能見到有關郭氏史學方面的著作祇有一本《史記札記》。由於郭氏生前並未有將此書問世，所以其中有很多意見是深觸當時忌諱的，然此正足以表現他思想的超俗。陸氏歸納此書重點如下：一、郭氏認為禮、樂是「聖人所紀綱萬事，宰制群動」的。二、郭氏對於君主專制政治表示了十分不滿的態度。三、郭氏以為夷狄侵略中國，自中國而言，有兩種弱點存在，所以為敵所乘，一是中國的法令煩苛，使上下離心；另一

^① 參陸寶千：〈郭嵩燾〉，收入《中國歷代思想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44冊，頁5-7。

^② 同前註，頁8-10。

則是人材的缺乏。四、郭氏主張中國與別國應和平相處。五、重視工商業^⑬。

至於郭嵩燾的洋務思想，陸寶千除了在〈郭嵩燾〉文中有論述外，在《清代思想史》第八章中亦特立一小節專論郭嵩燾的洋務思想。綜合二者，陸氏認為郭氏的洋務思想可從外交與內政兩方面來談。就外交原則講：第一個重要觀念即是「循理」；第二個觀念則是「以德服人」，主張應以誠信、平等對待洋人。而就內政方面而言，郭氏十分重視本末之辨。早年他認為吏治紀綱是本，後來他所謂的本更進一步地擴大到「教」、「學」、「風俗」、「社會經濟」等各層面，甚至將這些合而言之了。由於郭氏既明於本末之辨，所以他對西方文化的看法亦從分別本末著眼。其嘗謂「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他的這種見解與當時一般醉心於船堅炮利者相比，真復乎絕遠了。郭氏既對西洋文化瞭解如此之深，所以他主張取法西洋，從包括政教之取法到社會經濟之發展，郭氏皆有詳密且完整的建議^⑭。

陸氏在《清代思想史》一書中討論到郭嵩燾洋務思想的來源，他認為係得之於理學。在他看來郭嵩燾既精研理學，而「窮理」本為程朱一系之理學工夫，所以郭氏洋務思想中之核心觀念——「循理」之由此而出，乃無庸置疑的。不僅於此，陸氏還追溯郭嵩燾許多辦理洋務的主張，其背後的觀念或學理亦係來自傳統學術思想，如其論出使肆應之本來自於他對《禮記·曲禮篇》「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的體會；又如他力主採用西方之學制、商制而行之中國，亦本之於《禮記·禮器篇》「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的說法；又如他因光緒元年(1875)馬嘉理案參劾雲南巡撫岑毓英(1829-1889)不能保護英國通事，亦援引《周禮》以責之。此外，郭氏之邃力於史而用之於洋務時事，更不在話下。陸氏概括綜論郭嵩燾洋務思想之基本觀念的形成，蓋由實踐理學，鋪經啜史而得。不過陸氏也指出，在數千年天朝觀念籠罩之下，儒家的國際思想闡鬱弗彰。郭氏特拈「循理」二字，申之以誠信、平等、和平諸義，儒家外王思想之一面，由此而顯，此確為郭氏洋務思想價值之所在。然而郭氏這種根源於儒家的正而不譎的洋務思想，持之以肆應於「無理性」的國際社會，卻實嫌不足，然此僅是郭嵩燾個人之缺

^⑬ 同前註，頁11-15。

^⑭ 同前註，頁16-233；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年3版），第8章，頁372-402。

陷，抑或儒家思想本身之不足？陸氏最後拋出這個問題供人們深思¹⁵。

（四）黎志剛：〈郭嵩燾的經世思想〉，收入《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頁509-530。

儘管陸寶千教授在郭嵩燾這個案例中發現到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在面對近代文明世界時所可能有的缺陷或不足，但畢竟郭嵩燾在那個時代中還是願意積極正面的去回應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戰，不但在政治社會經濟的層面如此，甚至在涉及學術思想文化的層面亦然。所以當他在面對西方文明或處理洋務時，中國的傳統學術思想（尤其是經學、理學、史學）常成為他思考的資源。從他們那時人們的學術養成背景來看，這是很自然的舉動。但在今日，傳統學術思想已非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養成的必要及主要成分，反倒是以西方學術為基礎的現代學術早已根深蒂固地占領現代知識分子的思維與意識，如何面對及理解傳統學術反而變成是煞費思量的棘手課題。

黎志剛〈郭嵩燾的經世思想〉一文，其重點雖然是論述郭氏的經世思想，諸如其發展理論、政治教育及社會思想、經濟思想與外交思想等，但黎氏也注意到了一個頗為有趣的面向，那就是郭嵩燾對中西文化的瞭解。深浸於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當中的郭嵩燾，憑著他開放的胸襟及旺盛的求知慾，他比同時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更熱心於學習西方知識。而他在學習與理解的過程中，也常會回頭過來嘗試用他所熟悉的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概念術語去理解西方的學術思想，甚至加以相互比較評判。這與我們今日習慣用西方的學術概念來理解中國的傳統學術思想，確實是有極大的不同。

黎志剛從《郭嵩燾日記》中看到了郭嵩燾知悉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和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經濟思想，也知道孔德哲學(Comtism)，還把古希臘哲學家諸如泰勒斯(Thales)、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和伊比鳩魯(Epicurus)等人的哲理記下，指出泰西學問皆根源於此。他甚至還記下西方科學和哲學觀念之發展，如把培根(Bacon)、伽里略(Galileo)、牛頓(Newton)、笛卡爾(Descartes)、萊布尼滋(Leibniz)等人的理論記在日記中。黎氏認為郭嵩燾對笛卡爾的「系統懷疑論」表

¹⁵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頁402-412。

述的相當具體和準確，判斷可能是郭氏受過去研究理學的影響所致。此外，黎氏還看到了郭嵩燾在日記中記下他對儒家思想、佛教、基督教義等文化的比較，直指儒家思想「專於自守」，是保守的，而基督教精神則是愛人和進取的^⑩。

對現代西方文明具有一定程度理解的郭嵩燾再回頭去看他最熟悉的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時，他的視野和心態已或多或少和那些一直浸漬在傳統學術氛圍中的知識分子有所不同，所以他雖和當時大多數的學者一樣，廣泛地研治經史古籍，但黎氏認為他為達到通經致用的理想，把中國古籍重新加以時代的解釋，以作為變法之依據^⑪。這從上述陸寶千對郭嵩燾學術所抽繹出的重點即可印證黎氏這個判斷大體上應是可以成立的。

（五）孫致文：〈郭嵩燾禮記質疑解經方法及態度初探〉，收入《第六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歷：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2000年3月，頁253-272。

郭嵩燾研治傳統學術雖有深受時代影響之痕跡，甚至嘗試結合經義史實與洋務時事，一方面從經義史實尋求啓發，以之為處理洋務及面對時事的建議；另一方面則又從洋務與時事的敏銳感受中，重新為經義史實的詮釋注入新的意涵。但這些並未損及郭嵩燾研治經典的嚴謹學風，從孫致文〈郭嵩燾禮記質疑解經方法及態度初探〉一文中令人感受到的是一位治學嚴格，實事求是的經典學者。

孫氏此文檢討了郭嵩燾《禮記質疑》的解經方法和立說態度。就前者而言，孫氏分別從「訓釋字詞」、「離析章句」、「擱置典籍文句」及「《禮記》所記不必為史實」等四項解經方法來加以探討。而就後者來說，孫氏亦標舉出郭嵩燾「即經以求義，反對改經立說」、「實事求是，不強為會通」等兩項立說之態度。孫氏由此得出郭嵩燾撰作此書的目的，不僅在於兼存漢、宋，更是直接面對經典，作出較前人更適當的理解，而且郭氏在疏解經文時能敏銳的指出問題，並大膽推翻舊注，建立新說，同時亦不拘執於文本，也不牽強附會以求融通。

但孫氏研究也發現，郭氏在解經過程中大體都立論有據，但也有部分篇章是在

^⑩ 以上俱參黎志剛：〈郭嵩燾的經世思想〉，收入《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頁515-517。

^⑪ 同前註，頁513。

沒有充分證據支援下立論的，仍有值得商榷之處。總的來說，孫氏認為和乾嘉學者相較，郭嵩燾的考據顯得不夠嚴密。雖然郭氏一再標榜泯除「漢學」、「宋學」的門戶藩籬，而在實際解經過程中他也試圖用被認定為「漢學」一派學者常用的考據方法，但從他對經典義理的強調，而於考據稍有輕忽的情況來看，孫氏認為郭嵩燾顯然是較近於「宋學」的¹⁸。

三、結 論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底下幾個觀察：

- 第一，臺灣學界對郭嵩燾的研究雖然取得一定的成績，但整體來看，在研究成果的數量上仍不夠多，有待學界持續投入研究。
- 第二，研究領域較偏重歷史學的研究，諸如年譜、傳記及洋務活動等，對其學術思想的研究稍嫌不足。且研究的學者之學門屬性亦大多偏重歷史學門，中文學門的學者對郭嵩燾學術之研究實屬鳳毛麟角（上面評介的學者僅孫致文為中文學門的學者）。這造成的現象是：學界對郭嵩燾在傳統學術思想（特別是經學與理學）方面的表現之研究呈現偏枯的狀況。
- 第三，郭嵩燾學術思想中的傳統成分與現代（以西洋為主）成分之關係、交涉與相互影響的課題值得進一步深入開發研究。特別是根植於其思維意識當中的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如何與近代文明對話，這種對話是否有可能使其不但可以適應於新的時代，而且還可以不斷地更新且持續地散發影響力？或許對郭嵩燾本人來說，他對這個課題並沒有那麼高度的自覺與敏銳的感受，但對關心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出路的人來說，這確實是個極為重要且嚴肅的課題，郭嵩燾的經驗或許可為關心此課題的學者提供一個極佳的參考範例。

¹⁸ 孫致文：〈郭嵩燾禮記質疑解經方法及態度初探〉，收入《第六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2000年），頁253-272。